

国际共运史话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国际共运史话

柳振铎 周作翰 刘知行 方光明 主编

(修订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福州

国际共运史话

柳振铎 周作翰 刘知行 方光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375印张 197千字

1984年8月第2版

1984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5,401—12,530

书号：3173·276 定价：1.00元

序 言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交织着高潮和低潮，奔泻和回流，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挫折。它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编织成绚丽的历史画卷。

不知道昨天，也就不理解今天，更难以预测明天。通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科学，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承国际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前景，都有重大的意义。学习国际革命经验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就读书而言，各类读物各有其突出的特点。马列著作有其深刻性，历史文献有其真实性，教材课本有其系统性，但都不免枯燥一些。而史话一类读物形象、生动，有其通俗性，更易于引起广大群众的学习兴趣，尤其是更易于激起初学者的学习热情。本书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通过这本史话，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怎样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在黑夜中的第一次伟大搏斗开始，怎样到1871年巴黎公社显露出黎明的曙光，怎样在1917年迎来了斑斓的朝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怎样在1949年东方终于升起了鲜红的太阳。史话如实地描述了革命先辈们披荆斩棘、英勇创业的史迹；也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退却和妥协的策略以及失误和挫折的教训。这就提醒我们在阔步向前时要善于迂回，还

要留心陷阱。

通过这本史话，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政党怎样从马克思、恩格斯手创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步，经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前仆后继的斗争，达到今天这样的阵容和素质。我们的队伍步伐一致，纪律严明，群星灿烂，英雄辈出。但是也还有漏洞和缺陷，也不免时有跳蚤混入，偶有沉渣泛起。怎样修整改易，补苴罅漏，激浊扬清，荡去污秽，这正是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的大事。

通过这本史话，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先烈的光辉业绩。第一小提琴手协同第二小提琴手（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发出了美妙的和弦与激越的奏鸣；勇猛的海燕（象列宁那样）迎着雷电在白沫泛起的海上飞掠；矫健的雄鹰（象卢森堡那样）展开翅膀在乌云翻滚的高空翱翔。他们的高风亮节、雄才大略激励着我们刻苦磨炼，紧步追随。

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的几位教师，根据他们多年的教学实践，选择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四十余个事件和人物，以生动的事实、文艺的笔调编写了这本史话。承编写者的盛情雅意，嘱我代写一篇序言。本书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史话，我相信它在普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方面会起到良好的作用。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福建人民出版社乐于出版本书。因缘际会，谨向故乡人民致以由衷的问候！

高 放

1981年5月26日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目 录

三个狂人	柳振铎 (1)
巴黎会见	卢新梅 (7)
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卢新梅 (12)
第一次伟大战斗	柳振铎 (19)
第二小提琴手	方光明 (24)
圣马丁堂聚会	
——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	胡茂材 (29)
公社战士墙	周作翰 王先胜 (36)
社会革命的曙光	邓可吾 李世玲 (45)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周作翰 (54)
海格特公墓	毕玲蕾 (60)
成立“一个行动的团体”	
——第二国际的诞生	方光明 黄学规 (66)
龙种——跳蚤	方光明 余振波 (71)
无产者光辉战斗的节日	张 强 (78)
恩格斯的遗嘱	孙嘉萍 (85)
“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方光明 (90)
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查琴芝 (96)
流血星期天	金 凤 (102)
蔡特金和“三·八”国际妇女节	邓国华 (107)
革命之鹰	邓可吾 (111)

“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周纪良 (121)
第二国际的破产	刘知行 徐 斌 (127)
炮轰冬宫	施茂铭 (133)
沉浮的泛起	李惠康 (140)
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	王先胜 (145)
布列斯特和约	王果纯 (153)
一位思想家和学者的“悲剧”	孙嘉萍 (160)
工人领袖不是天使	李惠康 (167)
为了进攻的退却	李惠康 (175)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黄百炼 (181)
粉碎托洛茨基主义	余振波 (188)
“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王 志 (197)
肃反和扩大化	毕玲蕾 (204)
来自柏林的情报	王先胜 (209)
季米特洛夫	陈安众 孙兴林 (217)
“德黑兰”会议和白劳德主义	刘知行 (227)
胡伯伯	周作翰 邓可吾 (233)
瓦尔特——铁托——铁	周纪良 (241)
“朝鲜不独立，决不再回故土”	稼夫 (247)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柳振铎 (254)
后记	(259)

三个狂人

柳 振 铎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欧洲出现了三个被人称之为“狂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就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从一般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确是“狂人”。

他们全盘否定资产阶级视之为“天堂”的世俗社会。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虽然出身贵族，但他在十九岁时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为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放弃了伯爵头衔，下过监狱，恩格斯称他为“法国大革命的产儿”。1802年开始，他埋头著述。在贫病交加、又被妻子抛弃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等一系列巨著，揭示了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明确指出：“现代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的写照”。另一个法国人傅立叶（1772—1837），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本人是一个店员。他以更尖刻的讽刺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人都用欺骗公众的方法来寻求自己利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英国人欧文（1771—1858）生于一个贫困的手工业家庭。英国工业革命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与不幸，使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比圣西门和傅立叶又前进一步。他认为一切罪恶都是由私有制度、宗教制度和婚姻制度产生的，而其中私有制度又是敌对、欺骗、舞弊、卖淫、贫困、犯罪和痛苦的根源，所以他说，私有制把人变成魔鬼，把世

界变成地狱；当私有制还存在的时候，人类幸福是不可能有的。根据他的计算，很大部分应该属于劳动者的财富落到工厂所有者那里去了，因此造成了剥削。马克思因而称欧文为“最先对资本理论挑战的”英国理论家。但他们这种同世俗见解格格不入的“谬论”，在当时毫无疑问是要被说成是“疯子”、“狂人”的。

其实，他们的“狂”还不止于此。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想办一些事实上做不到的事情，这在一般庸人眼里，就更加显得“狂”了。

圣西门深恶痛绝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非常同情“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他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想用自己设计的新社会取而代之。他把自己设计的这种新社会制度叫做“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实业家成为国家的第一阶级，并掌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力。这种新社会将保证劳动大众经常有工作做，在统一计划指导下，每个人都参加劳动，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造福。圣西门认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阶级压迫将被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也将不再存在，政治将由主要是管理人的活动变成主要是管理生产的活动。同时代人说圣西门“狂”，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设计太荒唐了。

傅立叶的“狂”比圣西门又进了一步。他一生都在资本主义商界度过，对资本主义商业的黑幕了解得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经济的黑暗，社会道德的堕落，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藪。”因而他宣布：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去纠正它，而是要力求消灭它。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是“协作制度”。“协作制度”的基层组织叫“法朗吉”。在“法朗吉”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大家

共同劳动，按个人的劳动、资本和技能来分配收入；普及义务教育，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灭城乡的对立。傅立叶非常重视妇女的解放，他第一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可是，傅立叶这些设想，都被人看成是“狂人”的表现。

欧文的“狂”，比圣西门和傅立叶又进了一步。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并不废除私有制，在他的“实业制度”下，还有贫富差别。在傅立叶的“法朗吉”里也保存私有制，社会成员的收入以劳动、资本、知识的十二分之五、十二分之四、十二分之三进行分配。这样分配的结果必然使“法朗吉”中的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变成了食利者。而欧文主张的未来社会制度是没有私有制的，实行的是财产公有和按需分配的制度。1800年，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当他接管了岳父的工厂，成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织厂的经理的时候，便实行了一系列慈善措施，以改善厂内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当时，英国工人每天要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即使在危机使工厂停工期间，工人们仍然可以领取全部工资。于是“慈善家欧文”的名称立即蜚声全球，各国社会改革家都跑到新拉纳克来观光，连俄国沙皇尼古拉都曾去遨游。后来，欧文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工人生产的财富同他们消费的财富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到哪儿去了呢？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观察，欧文逐渐认识到：是企业主的利润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这个差额。他认为工人劳动果实应当属于劳动阶级，于是他设想了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将是各个“劳动公社”的联合体。“劳动公社”是这种社会的基本单位。在那里，将取消私有制，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给人们在德、智、体各方面以良好的教育。人人尽其

智能，按需分配，就这样，欧文从一个慈善家转向共产主义。恩格斯称赞他说：在欧文著作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的最坚决的共产主义陈述”^①。从1824年起，欧文和他的门徒们进行了多次关于共产主义的试验，幻想建立起一个移民区、合作社、劳动市场和劳动公社，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可是这些试验都失败了，他最终被踢出资本主义的上流社会，被人们看成是一个“疯子”、“狂人”。

当然，工人阶级了解这三位空想家，并不以为他们是“狂人”，相反地却热情歌颂他们的高尚行为。著名的《国际歌》作者、原傅立叶主义的信徒欧仁·鲍狄埃，就曾经写了一首《狂人辨》的诗歌。作者在诗中以傅立叶主义者自居，表达了当时工人的心声。他说：

“我坚定否定他们的逻辑，
戳穿他们诬我为‘狂人’的谎言。
我心向美好的新世界，
宛如磁针指北的罗盘！
什么都不能把我的志向改变。
即使被关进比塞特尔精神病院。
我仍要说：‘地球在转！’
我和这世界，究竟谁疯颠？！”^②

诗中的“他们”，就是指当时的资产阶级庸人，“我”指的是傅立叶主义者。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对“狂人”的诬陷终于被推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肯定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历史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

^②节引自《欧仁·鲍狄埃诗选》，比塞特尔精神病院在巴黎附近，始建于十世纪。

绩，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学说的根本缺陷。

正象伽利略^①指出“地球在转”的规律一样，他们的学说的确含有极丰富的真理。他们能看到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用辛辣的笔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这是十分可贵的。这种批判虽然未能触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及其基本矛盾，但它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其宝贵的材料。他们对未来社会作了幻想性的描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和合理的设想，例如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消灭三大差别、实行有计划生产，等等，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决不是“疯子”、“狂人”，而是三位伟大的“智者”和“天才”。

但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他们以“理性”支配世界，按照思想构造现实。恩格斯说他们是“用头立地”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设想的方案，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出发的，而是从他们的头脑中发明出来的。怎样实现他们的方案呢？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只要被发现出来，从外面强加给社会，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拯救人类。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不论在五百年前，还是在五百年后，关键只在于有“某种天才头脑”的人。所以，他们不依靠无产阶级，尤其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搞暴力革命。在他们心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人数最多的阶级。但这个阶级只是一个“溃疡”，它不能自立自救。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依靠那些富人、智者和王公

^①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著名科学家，因反对地心说，宣传“地球在转”而被罗马教廷斥为大逆不道，判刑管制。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贵族的帮助。他们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①，却“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②他们写信给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女王，俄国的沙皇，美国的总统和法国的大银行家，乞求帮助实现他们的方案，结果只听到一片“疯子”、“狂人”的嘲笑和骂声。例如傅立叶，他幻想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不是到工人群众中，而是到资本家、社会统治者中寻找同情和支持者。他曾在报刊上刊登广告，说他准备每天中午十二点在家接见打算出资创办“法朗吉”的富翁。后来，傅立叶不论去什么地方，总是要在中午十二点前赶回家，以便接待来访者。可是等了好多年，尽管他总是翘首以待，却从来没有一个富翁和社会上层分子登门问津。

三位思想家的学说之所以存在着这些根本缺陷，一是他们本身唯心史观的局限。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不很发展，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所以只能从头脑中幻想一通，被同时代人看成是“疯子”、“狂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③因此，要使社会主义理论成熟起来，从空想变成科学，必须把它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投身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武装了国际无产阶级，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巴 黎 会 见

卢 新 梅

1844年8月底的一天，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市区田兑路一所简朴的住房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的年轻人。他的脸上带着几分急切的表情和难以抑制的兴奋，右手轻轻地敲着门。门开了，正在伏案写作的马克思一见这个客人，马上高兴得大叫起来：“你来了，恩格斯，我亲爱的朋友！”他们两人紧紧地拥抱着。

恩格斯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回德国路经巴黎，专程来看望想念已久的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也早就热烈地期待着恩格斯的来临。恩格斯一到，他们立即就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进行了促膝交谈。他俩欣喜地发现，在科学理论方面，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他们的观点都不谋而合。特别是关于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及其神圣使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彼此的观点都完全相同。正如恩格斯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的：“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①当时恩格斯非常高兴，在马克思家里一住就是十天。在这宝贵的十天里，马克思把法国工人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和他在巴黎的战友介绍给恩格斯，并和他一起深入工人家庭，和工人们一起参加各种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和聚会。回来以后，他们又亲切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地长时间地交换相互的感受和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他们两人的心是如此地相通，以至双方都感到分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马克思高兴地预料到：这次恩格斯的到来，必定给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告诉恩格斯，最近他准备写一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既然恩格斯和他在世界观和政治理论观点上已经趋于一致，那么完全可以进行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撰写此文。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建议，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在作了详细的提纲和具体分工后，两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每当喧闹了一天的巴黎街头已是繁星闪烁、万户寂静的时候，马克思的小屋子里却还灯火通亮，窗前经常映出这两位革命导师专心写作或热烈讨论的身影。他俩在理论观点上是一致的，在写作上却各有特点和风格。马克思落笔稳健，一字一句都要细心推敲。恩格斯则思路敏捷，文笔流畅，速度很快。这些特点使他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写的早期著名著作之一是《神圣家族》。这部著作除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荒谬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真正的历史创造者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②，“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③列宁认为，《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就这样，在付出了很大心血后，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致观点，第一次溶合在一部共同的著作中，它标志着这两个朋友已把自己的生命紧紧地溶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了。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激动地说：“我没有比在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同上书，第44页。

③同上书，第45页。

家一起渡过的十天，再愉快而富于人生乐趣了。”^①

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使马克思、恩格斯深深地感到：共同的政治抱负、共同的世界观以及科学理论观点的一致是他们友谊和合作的坚实基础。失去了这一基础，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友谊。1842年11月底，他们有过一次相见，但那是一次极其冷淡的会面。当时恩格斯离开家要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工作，中途在科伦停留，到《莱茵报》社拜访了马克思。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互相不太了解，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同时，又由于在恩格斯来到科伦的前几天，马克思拒绝了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寄来的一些内容空洞的论文，双方发生了冲突。恩格斯正好是从柏林来的，所以马克思误认为他是为他们说情的，态度当然不很热烈。恩格斯丝毫不介意。马克思渐渐发现恩格斯这位比自己年轻两岁的同志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怀着非常炽热的感情和战斗的勇气，他的整颗心都在为英国的“下层阶级”而跳动；他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对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他具有非常深邃的思想。在恩格斯方面，也越来越感到马克思是立志献身于人类的幸福、具有无比渊博知识的一位英明的导师。

巴黎会见结友谊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出身、经历、性格各不相同，他们所以能够结成终生挚友，在于通过不同的道路，完成了两个伟大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是德国人，出身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律师家庭。1838年，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当时他思想上信仰唯心主义，政治上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从事写作政论文章，批判政府和“老年黑格尔派”。1842年2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6页。

马克思著文批判反动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虽被官方扣压不让刊登，但也引起人们的注意。1842年10月，卢格聘请马克思担任他所办的《莱茵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订户从原来885个增加到3200个。1843年，反动政府查封《莱茵报》，胁迫马克思“改变态度”。《莱茵报》大多数股东也劝马克思降低“调子”。马克思断然拒绝，声称“我不能降低自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由于直接接触现实政治问题，马克思渐渐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不敢彻底摧毁黑格尔的反动唯心主义体系的弱点，于是决心冲破这种思想束缚，开始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3年11月，马克思迁到法国巴黎，住在工人住宅区，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并同法、德两国工人秘密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发表演说。在巴黎，马克思还继续读书、写作，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常常是接连三、四天不分白天黑夜地辛勤工作。他常常说：生活就是工作，而工作就是战斗。在巴黎一年多的活动，马克思完成了两个伟大转变。

恩格斯也是德国人，出身于一个大工厂主的家庭。恩格斯在童年时代，亲眼看到故乡乌培河谷工人的悲惨生活，从小形成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他中学还没有毕业，父亲就送他到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去当办事员，希望儿子在商业界飞黄腾达。恩格斯可不管这一套。他在从事商业的同时，挤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观察工人生活。现实生活推动恩格斯开展思想斗争，决心摆脱家庭影响。这时的恩格斯，思想上信仰唯心主义，政治上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1841年秋，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一方面研究军事，一方面到柏林大学听课。他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和哲学论战，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又被他父亲送